

# 知识人的道德责任决定知识的未来\*

[美] 彼得·F·德鲁克著, 王玉生译

**摘要:** 在现代社会, 拥有知识即意味着拥有权力和财富, 但知识人应负起相应的道德责任, 而非用知识去向社会索取, 关键是我们为社会奉献了什么! 这种道德责任决定了知识是否拥有未来。

**关键词:** 知识人; 道德责任; 未来

**中图分类号:** B8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8)03-0013-04

**译者简介:** 王玉生(1967-), 男,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南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

**作者简介:** 彼得·F·德鲁克(1909—2005), 奥地利籍美国管理学家、社会哲学家。世界公认的现代管理学之父, 全球顶尖企业 CEO 们首选的管理咨询顾问, 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著书 30 余部, 被翻译成至少 35 种语言, 内容涉及管理、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他是最早为人类揭示“知识工作者”、“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曙光的人之一。本文是他的《The Age of Discontinuity: Guideline to Our Changing Society》(1968, Harper & Row, Publishers) | 书中的最后一章: Does knowledge Have a future。德鲁克的所有后期重要思想几乎都能在此书找到雏形。

知识社会的中心道德问题将是知识人<sup>①</sup>的(道德)责任。

知识人在历史上并不拥有权势——至少在西方没有, 他们不过是些装饰品。如果说他们在权力的宝座上曾担当了什么角色, 那也不过是宫廷的弄臣而已。综观历史, “笔比剑强大”的格言绝不可信, 只配称作“知识人的精神鸦片”。知识是个好东西。它是苦难者的安慰物和出得起钱购买它的富人的快乐, 但惟独不是权力。的确, 到目前为止, 为知识准备的唯一职务就是做大人物的仆从。直到 19 世纪中叶之前, 牛津与剑桥都在培训神职人员, 欧洲的大学则在培训公务员。开设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的商业学校一直输送的是训练良好的职员, 而非企业家。

但如今, 知识拥有了权力, 它控制了通往机遇和擢升的途径。<sup>②</sup>科学家和学者不再仅仅是“随叫

随到者”, 他们是“出类拔萃者”。国家领导人对他们洗耳恭听。在国防、经济等关键领域, 什么政策须认真对待, 很大程度上由他们决定。他们还掌管了年青人的教育工作(formation)。

知识人不再贫穷, 相反, 他们是知识社会的真

\* 收稿日期: 2008-02-12

<sup>①</sup>知识人指原文中的: the man of knowledge; the learned。德鲁克所说的“the man of knowledge”不仅包括有学问、有知识的人或教育工作者, 还指求取知识的高校学生, 因此, 译者并没有把它们译为我们所熟悉的“知识分子”。“知识人”与德鲁克另两个重要概念“经济人”和“工业人”相对应。

<sup>②</sup>德鲁克意指作为知识传播者的学校, “通过是否接收入学或授予学位, 大学拥有是否赋予人工作和生计的权力”。参见德鲁克《管理: 使命、责任和实务》(使命篇),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 页。

正的“资本家”。学校的薪水增长很快。今天,只要小学、中学或者大学的老师还领着微薄的薪水过日子,那就是一个教育上“退步的”社会,就得遭受人才流失或技术落后的罪。通过获得研究资助或者当咨询顾问,知识人教学工作之外的赚钱机会不断增多。

但是,权力和财富承负着责任。

有学问的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知识,但知识并不是智慧。所以,知识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必须尽快地承担起责任,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同其他曾经进入权力中心的社会群体没有什么分别。他们太过确信,他们今天所得到的一切,归功于他们的美德,而且无需除“目的纯洁”之外的任何辩护。他们太过确信,质疑他们动机的人不是白痴就是坏心眼,不是反智者就是麦卡锡主义者。然而知识人将发现,权力只有通过它的责任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

知识人将会发现自己很难接受如下事实:关于知识的基本决策是政治的决策,而不是知识的决策,因而已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外。他们会发现,更难接受的是,尽管他们并不做决策,却要他们对这些决策负责。但是除非他们接受这个事实,否则他们将无法染指这些决策,而这些决策又是不得不做的。他们惟一的选择,不是负责任地参与其中,就是被动地卷入。

我们还以高标准的道德准则要求他们。他们对此十分惊讶。他们总是为自己的不偏不倚以及科学的道德立场而骄傲。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是美德的化身。但是,当知识无权无势时作为个人私德来说可能已充足的品德与知识作为一个有权有势的群体品质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今天的知识人的确与19世纪后期的商人立场一样——后者假定商业道德是其“私人事务”。对于权势的知识群体而言,轻率地假定道德正当性——只要心是纯洁的、动机是正义的——是极度不道德的。

轰动一时的“卡米洛计划”事件是个典型事例。卡米洛<sup>①</sup>是一项绝密但在世界范围进行的研究项目的代号,在60年代初由一群美国人类学家所构想出来。大多数参与者来自“自由主义者左派”,而且“其中不可能有越南战争的支持者”(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罗伯特·A·累斯比特:“卡米洛计划分析”,《公共利益》秋季号,1966,作者原注)。卡米洛计划的目的在于:(a)系统地识

别社会崩溃的征兆,(b)验明可以预防社会崩溃的行为。

1963年,美国陆军接受了卡米洛提议,为之提供了600万美元的预算。我想,这是历来单个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最多的预算,应该足够资助几千个研究者——人数大大超过世界上(更不用说美国的)合格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该研究将在世界各角落展开:拉丁美洲、中东、远东、欧洲和非洲——除了美国的黑人贫民窟,这里是引起问题并迫切需要解决问题的答案的地方。

卡米洛计划在启动之前就流产了。一位年轻成员不经意地向一位智利社会科学家提到此计划,后者将之透露给一家智利左翼报纸。正如大家都可预见的那样,整个计划瞬间崩溃。智利国民议会召开了一次正式听证会。智利政府——而且很明显,许多别的拉丁美洲国家政府——正式向白宫抗议,反对如此粗暴地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

1965年,约翰逊总统终于下令停止卡米洛计划,并颁布一道指令,要求以后所有政府资助的美国本土之外的研究项目必须经由国务卿批准,以不悖于美国外交政策。两年之后,由于各种受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学术组织被揭露出来,所有表面上自筹经费而暗地里受美国政府资助的学术研究工作都被叫停。这样的研究工作从此必须公开透明,这当然能够将类似卡米洛的事件防范于未然。

但卡米洛计划绝对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600万美元的骗局。根本不存在能够回答“是什么引起社会崩溃”此类问题的研究技术,更不用说解决“如何防止社会崩溃”的问题。计划的发起人对此心知肚明——世界上的每一个社会科学家都心知肚明。他们也清楚得很,它的研究目标范围之大,足以囊括所有可以想到的人人梦寐以求的社会科学研究和调研。毕竟,任何事情都可以是一个可能的“引起社会崩溃的原因”:从红杏出墙、性混乱到青少年买苏打水的方式。他们声称,了解这些事情终究是“好”的。“假如让政府资助社会科学研究的唯一途径是撒谎,这样做又何妨?”正如累斯比特教授所描述的,卡米洛计划被撤消时,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的唯一评论是:这“翻开了政府歧视行为科学的新篇章”。

既然知识拥有权力和经济收入,仍然可以接受

<sup>①</sup> Camelot: 传说中亚瑟王的宫廷,圆桌会议所在地;引申为和平与强大。

和允许这样的双重标准吗？

假如资金是以诚实的方式获得的，此类研究项目就能证明是合理的？抑或该研究会不会干涉、侵犯社群（community）和私人的生活？在探求知识的过程中，可以做什么就没有任何限制吗？

最后，军方资助此类研究项目是正当的吗？对此类研究的成果，军方可能利用什么？军方资助它们的理由是什么？卡米洛计划的拥护者们——在美国社会科学家中人数明显占优——这样回答它：“但是不存在军方可以利用的研究结果，对此我们很清楚。”然而，持相同观点的社会科学家可能已经实施此类研究了，尽管他们得到的是所预期的结果。他们看重的是钱。至于军方掌握这些研究成果，可能导致发生他们（作为自由主义者）懊悔的事情，毫不夸张地说，就不关他们什么事了。他们甚至不理解，当卡米洛计划泄密时，为什么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如坐针毡。

无独有偶，1967年人们发现纽约的医生，在病人不知情或没有征得病人同意的情况下，给晚期癌症病人注射未经测试的危险药物；当医生们的行为受到调查时，他们既伤心又震惊——即使他们已经违背颁布与确认了的医学伦理准则以及触犯了州法律条款。但他们申辩，他们毕竟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好处，他们唯一想做的，无非是获取知识，去帮助受病魔折磨的人。指责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最严重的犯罪：非专业人士干涉医学研究，在专业研究领域只有研究者的同行有资格发表意见，而且只能评价该研究发现的科学上的真实有效性。

知识的道德确实应该由专业同行决定与控制。它应该自我掌控，像任何自我尊重的职业所进行的一样。但如果知识人拒绝应对知识的道德问题，甚至否认这一问题的存在（一如他们仍然在做的），社会将不可避免地来应对它——正如社会惩罚了纽约的医生，而不是把它交与医学教授们。因为权力往往引起道德问题。不管动机是什么，欺诈就是欺诈。卡米洛计划绝非唯一的例子——利用十足的不诚实和误导来套取政府或基金会的资助。只要大笔的钱流向某个地方，人们就得提防那些聪明的运作者。如果知识社群自己不这么做，相应的强制措施就会落到它头上。同样地，不道德行为不能因为无人从中获利就得到谅解。

相对于我们不得不深思熟虑并寻求解决方案的知识权力的道德问题，这只是一个事例、一个领域。知识社群、特别是教育者想方设法保护自己垄

断权的限制性规则合乎道德吗？能够证明要求具备博士学位是合理的吗（自然科学领域也许例外）？何以见得博士学位使人成为更好的老师甚或更好的学者？此类准入限制的主要理由，是它为买票进入学术大门而付出时间和金钱的人们留得任职和薪水的权利吗？

终生雇佣制在道德上站得住脚吗？我们确实需要提防对教职员工的政治压迫和行政管理上的专制。但也许，保护终身雇佣制不是比政治和行政上的强制更糟糕吗？我们就不能设计一种制度，让个人免于这些强制，而又使社群、学校、学生远离怠惰和无能吗？为什么不设立一个访问学者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每隔三到五年审查教员的绩效和表现？在美国我们已有超过2000所大专院校和80000所中小学校。因此，对于真正有能力的教师来说，如果被无理解雇，找到另一份工作还真的不难。我们的教职员工中太多有才能的人，一旦获得副教授或教授职务，拥有终身教职，就停止了努力工作。而没有终身雇佣制的工业研究实验室里，却很少听到对不应有的压力或迫害的抱怨。

只要知识人不拥有权力，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无关紧要。当然啦，它们依然存在。但它们仅仅影响相关群体中的成员。而一旦知识人处于社会权力的中心，它们就不再是“私事”。权力集团要么承担起权力的道德责任，要么堕落腐化。

同样迫切的是，知识人必须为教育的内容、标准、质量、绩效和社会影响负责任。

文凭不再像许多知识人恋恋不舍的那样重要了。他们的工作就是要让文凭具有社会效益或者摆脱文凭。教育的低社会效益要求他们承担责任。申请更多的钱、抱怨资金没有快速到位，都不是理由。

尤其重要的是，知识人必须为教育的绩效承担责任。责备学生无能不再被允许。学生不学习是学校教育失灵（failure）。而学生不想学习是学校的耻辱，是对学校的控诉，同样也是对老师的控告。

期待知识人主动为教育的绩效负责，难免幼稚。他们将是历史上第一个被期望这样做的群体。不过，跟其他前辈群体一样，知识人很快被要求承担责任。美国社会的下一波公众批评、义愤、反叛很可能被知识人的傲慢点燃。青年人的反叛已经箭在弦上。

但是，青年学生们同样面临责任问题，他们对此甚至更缺少准备。大学生是享有高度特权的群

体,他们几乎独占了知识社会的机遇。他们得到的社会资助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特权群体都多。学生也是一个很大的快速增长的群体。不管他们可能有多不愿意,现今他们已属于权势集团的一部分。

学生们在各地造反,要求共享大学和政府行使的权力。他们极少有人深刻认识到,享有权力等于肩负责任。几乎没人再问:“我奉献社会什么?”今天,很流行把学生称为“理想主义的”;他们自己就用这个术语。但理想主义本身不能证明权力的正当性,如同“诚实”不能证明谋杀是正当防卫一样。权力只能通过负责任的使用得到辩护。假如权力拥有者不负责任地使用权利,他将被恶魔所利用,来达到恶魔的非理想主义的目的。

今天的学生倾向于——尤以其中的新左派为甚——只会问:“社会能给我什么?”这问题本身没什么错,的确也要问这样的问题。只不过,它不是第一层次的问题,而是第二层次的。“我奉献什么?”排第一。千真万确的第一!——只要拥有特权、权力和机遇者把他的优势归功于别人的劳动——父母的,纳税人的,等等。

如果我们期待学生们的感激,我们活该失望。如果我们期望他们依从与接受他们的前辈给他们设立的社会和学校教育,我们自己就失却了青年人的特殊力量——他们的愿景、活力、勇气和想象力。但是,责任是我们、也能够要求他们的东西——他们的数量优势、特权和权力必须嵌入强烈的道德责任感。

这一切会让学生们震惊。几乎没有学生指望他们的抗议能够得到认真考虑。然而,这是一个有益的震惊——当且仅当因为它建设性地利用了当代青年人的真正力量。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最大的时代断裂(discontinuities)是知识地位和权利的转变。7000年以前或更早,人类发明了技艺。在此之前有过伟大的艺术家。史前人在法国、西班牙留下了岩洞壁画,在撒哈拉沙漠留下了岩画——再也没有比这更伟大的画家了。技艺提供了工具,使得普通人不必有非常高的天分,却能够有适当的可预期的绩效,并且通过有组织的系统的学徒制一代又一代地进步。技艺创造了劳动分工,使得经济绩效成为可能。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我们的祖先在东地中海的农业文明中,发展出全部的基本的社会、政治、经济机构,以及我们全部的职业和人类使用的大部分工具

(直至200年前)。技艺的发明创造了文明。

现在,我们将要进行另一次关键的转变。我们已开始把知识应用于工作。我认为,与先民相比,我们才开了个头。先民们用自己的特殊工具,通过长期艰苦的学徒制掌握技艺,第一次把狩猎变成专门的职业。但是,我们跨出的踉踉跄跄的这一步就已经显示:把知识应用于工作是一个伟大的激动人心的创意。它的潜能可能与首次发明的技艺的潜能一样大,发展历程也可能一样长。但知识应用于工作的冲击已经很大——这些冲击确实意味着巨变。<sup>①</sup>

与知识的这些影响一样巨大和深远的是对知识本身的影响。首要的,是知识转变成工作和绩效的基础,从而把责任加在知识人的身上。他如何接受与履行这一责任决定了知识的未来,甚至可能决定了知识是否拥有未来。

(责任编辑:彭介忠)

## Moral Responsibility of Man of Knowledge: the Decider of Future Knowledge

Written by Peter Drucker,  
Translated by Wang Yusheng

**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 possession of knowledge means possession of power and wealth. However, man of knowledge should shoulder their corresponding moral responsibility instead of charging from society. It is important to know what we have done for the society, and this moral responsibility decides whether knowledge has a future.

**Key words:** man of knowledge; moral responsibility; future

<sup>①</sup> 关于知识应用的演变引起社会经济变革的认识,德鲁克后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知识系统地、大规模地应用于工具制造,产生了“工业革命”;知识应用于工作,产生了“生产力革命”;知识应用于知识(创新),产生了“管理革命”。参见,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等著作。